

為民舉才

該是讓政治少帶點 個人情緒色彩的時候

撰文：STEVE ALMOND



幾年前，普林斯頓及史丹佛兩所大學的研究人員公布了一份有關美國民眾政治態度的研究，其結果簡言之，就是駭人聽聞。

其中最令人震驚的發現，是當前政治歧視的情況比種族歧視更加嚴重。而且，讓華府陷入輕蔑及對立的惡性循環的始作俑者正是選民。我們總愛抱怨那些政治人物不受控

制，但事實上他們是聽從我們之命行事。

另一份由埃默里大學政治學者亞伯拉莫維茲 Alan Abramowitz 及韋伯斯特 Steven Webster 進行的研究，則帶來更多令人憂心的消息。美國人愈來愈投入一種他們稱為「負面黨爭」的行為，意味著我們投票是出自對另一政黨的恐懼及憎惡，而非是對自身

政黨有正面的認同。

順道一提的是，這些負面觀點並非基於對敵對政黨的政策有任何高尚的反對理由，而是本質上就有著強烈的政黨意識。

亞伯拉莫維茲及韋伯斯特特別點出，愈來愈多選民自認為無黨無派——蓋洛普民調去年的數字是 43%——這代表政黨黨員的比例正在下滑。不幸的是，實際的投票數據顯示，這些人替自己貼上「無黨無派」的標籤，是為了避免被認定是盲從特定政黨。事實上，他們幾乎從未超越黨派。在美國政治中，「搖擺選民」根本已是瀕臨絕種的族群。

利明彰 Bill Bishop 於 2008 年的著作《大群體：為什麼志同道合的美國群體正在撕裂我們》（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就詳細記錄下為這種兩極化添柴火的重大文化變遷。他的基本論點是：美國人愈來愈自我隔離。我們讓自己身邊都是相同階級、教育程度和意識形態的人。先別管紅（共和黨）州和藍（民主黨）州了，我們現在談的是紅區和藍區。

在此同時，我們對「政治」的定義在過去半個世紀也變了。我們以往把政治視為一種公民的集體行動，是社會試圖解決共同危機的手

段。如今，政治的運作成為一種認同。在我們眼中，那些支持其他政黨的人，並不是和我們有著許多相同的基本目標和價值觀的鄰人，而是一群抽象的陌生人，企圖摧毀我們所珍視的一切。

我還記得跟父母和他們一群朋友一起觀看 1980 年美國總統大選開票結果的場景。那年雷根擊敗了卡特。我家客廳擠滿了歡欣鼓舞的雷根迷和垂頭喪氣的卡特支持者，但整體氣氛是心平氣和的。各位試著想像今天會是什麼場景。

天哪，看看現在正在我們眼前上演的這場總統大選割喉戰。不管各位對選舉結果有什麼看法，我們都能同意，2016 年大選代表著政治的惡語相向已至低下不堪的程度。

所以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開始讓政治少帶點個人情緒的色彩？又要如何避免政治歧視？

對我而言，這一切需要有自覺地努力擺脫某些理智和情感上的習慣。講白了，這些習慣就代表著我內心的歧視。

其中之一有幫助的是我的小孩，他們經常是我們為人父母的哈哈鏡和回音室。當您的 9 歲女兒開始在晚餐餐桌上哼唱著一首淫猥的歌謠來嘲弄某位候選人的屁股時，最恰當的反應並不是

笑，而是意識到您已經開始在某種基本的層面上培養孩子心中的政治歧視。

我並不是說父母親沒有權利在子女面前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但經常我們形於外的只是憤怒及嘲弄。政治成為一個被許可盲從偏執的領域，而不是以禮相待的對話平台。

我一直努力試圖灌輸給我孩子的訊息是：民主是一種人民有特權支持任何候選人及理想的政府體制。我（一再）告訴他們，重點不在於你支持誰，而是你為什麼支持他們。

因為假使我們能更進一步探究我們奉行的教條，我們的政治信仰必然會回歸到某些深層的價值觀。以一個接近家庭的概念為例，就拿我的姻親來說好了，這次大選，他們又會再一次投票給我和妻子都不支持的候選人。

以往我們肯定會為此氣到發狂，而孩子們也會注意到我們的焦慮，有時甚至拿來模仿一番。這次的選舉季，我不斷鼓勵孩子們多思考他們的祖父母所堅持的價值觀——例如他們堅定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們身為年齡漸長的勞工在經濟上面臨的不安全感。

我希望他們了解，他們祖父母的政治傾向，乃至於其他同胞的也是，都只是反映個人的價值觀，而非道

德上的瑕疵。我也向他們強調，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祖父母都愛他們，只想給他們最好的。

在這個選舉季，我還注意到另外兩種在我看來更讓美國人充滿政治歧視的型態。

其一是與美國的新聞報導被產出與吸收方式出現劇烈變化有關。好幾年前，美國大多數的政治新聞都是透過報紙及少數幾家主要電視台提供給閱聽大眾。當時我們認為像默羅 Edward R. Murrow 一樣的記者或克隆凱 Walter Cronkite 之流的主播，才稱得上是客觀的新聞權威。

同時，還有所謂的「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規範著電視台及廣播電台探討政治議題的方式，必須「提供合理的機會，針對攸關公共利益的重大議題所持的對立觀點進行討論」。換言之，媒體通路並不被允許作為宣傳喉舌。1987 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廢除了「公平原則」，黨派媒體也因此崛起，特別是談話性電台。

往後這些年，這個「第四權」多半已淪為一種宣洩不滿的回音室。今日，美國人接收「新聞」的方式，一再加深（並煽動）我們的政黨正義感。專家們稱之為「確證偏見」：我們只找出

特定的新聞報導及社論，來佐證我們先入為主的觀點。

那意味著我們所觀看和閱讀的內容，不再是客觀看待這個世界，而是把自己塑造為受害者及／或英雄，而我們的政治對手各個十惡不赦的世界。

這已經讓理性的討論變得幾乎不可能。另一方不僅不認同我們的目標，對現況也有他們自己的詮釋，與我們的相牴觸。

而社群媒體興起所形成的論壇，讓對立的觀點得以相互激盪，但經常不是透過深思熟慮、語氣和緩的辯論，而是從怒氣沖沖的咆哮，迅速降格成充滿人身攻擊的謾罵。這種型態進一步減損了我們理解與同情政治對手的立場之能力，又同時加深我們在公共事務和政黨上的政治認同。

我們以往把政治視為一種公民的集體行動。如今，政治的運作成為一種認同。

但很久以前曾有一段時間，投票亭的聖地還有著更神聖的意義，亦即政治立場屬個人私密。道理很簡單：以往界定我們的，絕大多數是我們在家庭、社區和職場做出的貢獻，而非我們如何投票。以往別人評斷我們，看的是我們人格的內涵，而非我們的信條。

我年輕時的這個景象，如今依舊歷歷在目。儘管我的雙親在政治上相當活躍，

但幾乎從不談論隸屬於哪個政黨。他們敬重那些做出他們稱為「善行」的人：教師、執事、醫生及護士、交通指揮輔導員。

於是，作為一種文化，我們的許多行為在於找出如何保持對政治及公眾事務的參與，但不去詆毀那些目標與我們相左的人。

這可能會令人沮喪。如同這個選舉季所呈現的，候選人們經常表現得不像未來的領袖，而像小孩。但在民主制度中，有什麼樣的候選人，乃至於選戰，都是我們自找的。

這一切必須由我們每個公民自己動手改變我們思考和討論政治的方式，無論在網路上或公民生活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遠離那些專門利用負面黨爭的怨恨來蠱惑群眾的媒體通路，並向我們的子女塑造共同的價值觀而非基於鄙視的怨恨之上。

我們才是最終要交付給政治人物指令的人。我們需要告訴他們，經由妥協來解決問題，對我們而言比擊倒對手更有意義。

Steve Almond 是定期投稿人及作家，著有《Against Football: One Fan's Reluctant Manifesto》等書。